

卫道士与开拓者的奇异组合

——曾国藩新政思想论略

王艳玲

(华南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 在晚清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融合的社会剧变中,曾国藩集卫道士与开拓者于一身,是站在历史潮流浪尖上的人物。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望者,也是开一代风气的洋务派首领,其自强新政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关键词] 曾国藩; 自强新政; 卫道士; 开拓者

[中图分类号] K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271(2003)02-0080-04

A Wonder Combination of the Apologist and the Pioneer

——on Zeng Guofan's New Political Thoughts

WANG Yan-li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radical social changes resulted from fierce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Zeng Guofan, as an apologist and pioneer, was not only a loyal preserv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a leader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ith a forward-looking insight on top of the historical waves, he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era with his propositions of self-reliance and new politics and thus deserved a special status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Zeng Guofan; self-reliance and new politics; apologist; pioneer

在社会剧变中,在人类历史的岔路口上,历史往往要借助于某些历史代表人物进行相应的选择,而这些历史人物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位差优势,能够担此重任,站在历史潮流的浪尖代表或顺应历史做出选择。——曾国藩就是这样的历史人物。曾国藩是近代中国极具历史魅力的人物。他饱吸儒墨,但不固步自封;本为文弱书生,却成“中兴名臣”。从学问渊博的理学家到开一代风气的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与近代化的先驱先锋奇异地交织在他的身上。一方面,他恪守传统,忠君报国,道德功名至于鼎盛;另一方面,他又突破“华夷之辨”,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现实主义态度,为晚清思想的铁幕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一、“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祸乱如麻。曾国藩们的自强新政首先从引进和仿造具有中性文化价值色彩的军械入手(这也是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共性)。实际上,曾国藩早在1860年底就提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P58)}这可谓是新政思想最早的奠基。虽然林则徐、魏源二十年前就已发出“师夷长技”的时代强音,但如霜天雁鸣,风过无痕,而曾国藩的“师夷智”却落到了实处。他于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军事工厂,是洋务新政正式开始的标志。由承认自身的不足到以实际行动来捍御外侮,近代中国迈出了自强新政的较为坚实的第一步。从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时的全用汉

收稿日期:2003-02-10

作者简介:王艳玲(1968-),女,湖南祁东人,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人,不用洋员到请久处泰西的容闳出洋广为罗致懂行洋人来为我用,再到请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建立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就这样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航船的真正启动。江南局创立之际,日本的明治维新尚未开始,这说明由曾国藩真正发轫的中国近代化运动起步是比较早的,只是后来步履太过迟缓。

曾国藩身居高官要位,却少迂腐气息,反而有一种奋发进取、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他对西方机械化生产的高效率和科技产品赞叹不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向往。更可贵的是他还意识到应当学习西方先进器物的根本所在,即基础的科技知识和学理知识,而且率先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引进工作,为近代中国科学理性精神的培养与成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最典型的工作是集结科技人才,一手促成大规模的翻译西书活动,将西方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在办理种种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远比一般士大夫更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诸国科技与文化教育的先进与优越性,如他认为:“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3] (P154)} 这已经涉及到中西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 compares。1867 年,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局旁附设兵工机械学校,主要传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如机械工程理论与操作技术,这当为近代科学职业教育的萌芽。容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最高学府的留美学生,他热情洋溢,怀着赤诚的报国之心回到祖国,志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 (P89)}。但事与愿违,他的教育计划“怀之十年,不得一试”^{[3] (P149)},然而容闳毕竟有幸,遇到了曾国藩,相见恨晚,宿愿得偿。他欣喜万分:“因曾而予之教育计画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画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充类至义之尽,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不可谓非由此滥觞。”^{[3] (P105)} 尤值一提的是曾国藩全力支持容闳的教育主张,开近代留学运动之先河,做出了他个人在历史岔路口上最精彩的选择。关于由容闳首倡、曾国藩力促其成的中国第一个留学计划的丰富内容,吐依曲尔牧师阐述得颇为明白清晰:“这一计划是要借用美国优良的教育组织:学校、大学以及部分专门学校为这些学童提供方便。等他们的才智逐步增长后,再派他们攻读各种专门课程,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史和经济、国际法、民政原理与应用以及一切对现代行政有用的一切知识。”^{[3] (P85)} 如此“超前”的计划,能避免胎死腹中的命运,曾国藩功不可没。

虽然幼童留美事业后来中途夭折,但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容闳兴奋地宣称此举“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3] (P153)}。他饱含深情地说:虽然曾国藩不能亲“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固文正种因

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来自矣”。^{[3] (P154)} 的确,留美教育事业是中国教育主动走向世界的壮举,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走出国门的伟大实践。留学生们带回了异乡见闻、先进知识和民主观念,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当日后中国掀起一股留日、留美热潮时,容闳大发感叹:“是一八七〇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枝复生也。”^{[3] (P169)}

容闳作为先进的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是敏锐的,对曾国藩极为激赏。他断定说:“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3] (P147)} 一个满腹经纶的理学大师,居然与一个深受资本主义文明熏陶,一心想“藉西方文明之学术改良东方之文化”^{[3] (P149)} 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知己”,结为同志,相处欢洽,不啻中国近代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容闳一生的辉煌事业与曾国藩的大力支持息息相关,当然,曾国藩也因之而树立了他在历史上近代化前驱先锋的良好形象,两人相得益彰,这应该算得上是历史真正的良性互动。

在历史的岔路口,曾国藩没有象那些“以不变应万变”的衮衮诸公那样沉浸在往昔的荣耀与梦想当中,而是正面现实,通达顺变,对西方异质文化择长而用。他曾明确指出:“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4] (P77)} 这种思想和勇气表明他作为历史所寄予重托的人物的本色。

二、“和戎”与“制夷”

在对外交涉中,曾国藩所持的方针基本上是和与信。这一点颇遭史家非议,其实这种对外方针只是时代的特产而已。我们知道,洋务思想家们大都主和,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在某种意义上说,自曾国藩始,清王朝外交思想的核心由对抗演变成对话。近代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弱势地位,在对外交涉中难免表现出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而这注定了整个思想文化界和社会心理的基调。实际上,曾国藩的“和戎”和“制夷”思想是并存的,现在的“和戎”是为了将来的“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他指出:“洋人方敦和好,暂可羁縻,若思深虑远,当使兵力财力均能取胜于彼,庶几可刚可柔。”^{[5] (P64)} 这是颇有见地的,是客观务实的态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驭夷”思想开始成熟。他认为与洋人交际,“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9] (卷18, P15)},对洋人要以诚相待,谨守条约。条约既订,无奈之际,只能设法不让危害继续扩大,应当维持现状,争取“自立”“自强”。曾国藩说:“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6] (卷19, P32)} 因为崇尚“自强”“自立”,曾国藩在对外交涉时有抗拒力争的一面,李鸿章称其在一些“虚仪”的争执上有让步,而在关系到民生计的问题上则不含糊,曾国藩自

己则说:“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7](P35)} 这里的“虚仪”与“生计”很好地表达了曾国藩在做出历史选择时的倾向。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为“虚仪”而活,曾国藩也照样深浸其中,然而他毕竟看得远一些,既能守旧,又能开新,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几乎成为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的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可谓苦心孤诣,然而历史注定了他只能扮演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他在给天津士民的告谕中说:“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多方维持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皇上,可乎?”^{[8](P459)} 这一番韬光养晦的循循诱导似乎不无道理。当然,由于曾国藩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不到位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认识是模糊的,他认识不到列强绝对不会坐看中华民族的自立和自强,以“忠信笃敬”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回报终究是与虎谋皮。可以说,曾国藩用封建文化生硬地附会资本主义文化,错误地运用了“忠信笃敬”的古训。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通过曾国藩表现出它那苦涩无奈的一面。

如前所述,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和戎”与“制夷”是并存的,他之所以甘冒顽固势力的非难,毅然学习和引进西方长技,目的一是“剿发逆”,二是“勤远略”。^{[9](P168)}“剿发逆”是其阶级本质决定的,是眼前的应急之举,“师夷制夷”才是其长远的着眼点。其新政思想十分注重自立,他一度反对“借兵助剿”,主张只“会防”而不“会剿”。《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也是这位理学大师所痛心疾首的。

三、“卫道”与“救时”

曾国藩从孜孜于科举词章到潜心理学再到开一代风气,掀起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民族自救运动,在进步士大夫中领袖群伦,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相作用而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务实、变通的个人特质是他能够顺应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的基石。

首先,曾国藩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治学心态使他终能超拔流俗,建树宏阔。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注意吸收其它学派的长处来充实和完善自己,而且也不断地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营养来促进自己的发展或新生。曾国藩全面继承了传统文化汇纳百川、兼收并蓄、富于进取性的优秀品质,得以以一介儒生而建立赫赫功勋。他不同于一般抱残守缺的理学家,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如他认识到汉学和宋学各有短长,倡导会通、调和汉宋之学。汉学虽失之繁琐,但其实事求是、笃行实践的长处是应该吸取的。他从1846年开始,跟随汉学家刘传莹学习考据学,他们砥砺学问,相互影响至深。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还主张对诸子百家之长兼师并用,曾说:“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

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10](P62-63)} 这种博采众长的治学态度使得他不仅成为一代“通儒”,而且在社会跌荡剧烈、民族陷入危机之际,能较自然地进行着角色的转换,以典型的封建士大夫身份学习西方之“奇技淫巧”,充当勉力救时的角色。

其次,理学经世的思路促使曾国藩能够领悟儒家真谛,切近时务,破夷夏之辨。

清末正值经世致用思潮复兴之时,曾国藩更是深受湖湘文化中浓郁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熏染,故而能因时变通。他强调将经世实学融于义理之中,突破了以往“义理、考据、词章”的范畴,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剥离开来并与之相提并论,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骎骎日盛的求实务学学风使曾国藩注重实事求是,推崇“荷道以躬”。他将实事求是与程朱的“即物穷理”并称,说:“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8](P166)} 认为整天埋首于故纸堆之中,无异于并蛙跳梁,殊为可笑。正如有学者指出:“经世之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通向变易观念的部分;经世人物是传统社会里最切近时务而能亲知现实者。”^{[11](P232)} 的确,经世致用之学激发了曾国藩这位“抱道君子”的反思意识,促其毅然求变,开一代风气。

最后,社会环境和政治阅历推动曾国藩由一个“抱道君子”成为“救时英雄”。

曾国藩本为传统文化忠诚的卫道士,对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切的眷恋,一如其他士大夫,在社会剧变和残酷现实面前舐血自省,不得不以新卫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圣驾”仓皇出逃,曾国藩闻之不觉“且愧且愤,涕零如雨”^{[12](P1239)}。当他读到不平等条约的内容时,“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13](P557)} 曾国藩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他由翰林而从军从政,将传统文化中可用的东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既是典型的士大夫,更是一位建立了巨大事功的政治家,集多重角色于一身,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基本特征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朝廷高官的身份,镇压农民起义和与洋人打交道的丰富阅历与经验,使得他比一般整日埋首故纸堆、闭门造车的士大夫能更多更直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他因此而不甘止步于一代通儒的境界,而是要经世致用,付诸实践。他乐于为之,也能够为之,而这又何尝不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呢?!

曾国藩周围的一群幕僚策士对其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是一个网罗经世之才的大本营。郭嵩焘、容闳、薛福成、冯桂芬、郑观应、马建中、徐寿、李善兰等具有丰富西学修养与知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为其所用,这些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赖曾国藩之力而得一舒怀抱,一方面又推动着曾国藩担当起开近代风气之先的历史重任。

四、简要之评述

在社会剧变之际,曾国藩以朝廷重臣之尊,以“崇实黜虚”的价值观念为指针,将眼光由国人引以为傲的华夏之“声名文物”转向“蛮夷小邦”之“长技”,其思想模式为“中体西用”(这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非常恰当地蕴涵了曾国藩“卫道士”与“开拓者”合二为一的全部指征。蒋廷黻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曾有精当的评价:“他们对机器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器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到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13] (P45)} 曾国藩丝毫不怀疑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他所孜孜以求的“自强之道”只是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来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他眼里,封建纲常礼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最高明的。对留美学生他表示要“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2] (P155)}。曾国藩是名副其实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他的指导思想明确,对内对外的立场和观点也十分鲜明:“以忠刚慑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14] (P38)} 意即在坚守中华礼教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器之术”,以达到民族的复兴。与“制器之术”无甚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如他反对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夫人病危,儿辈请西医珍视,曾国藩的态度是“心甚非之而姑听之”^[15] (同治十年三月十九日)。对他认为于民生有害、于传统文化封建体制不利的东西,他也是坚决唱反调的。如他一直不同意在中国修建铁路,认为:“小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7] (P155)} 到后来兴修铁路的呼声再起时,他又说:“近年中国力拒外洋来开铁路之议,岂可反自中国作俑!此层决不可行。”^{[16] (P165)} 这未免有点食古不化了,似乎也可以诠释思想的超越时代是多么的不易。

当然,“中体西用”决非毫无是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内在逻辑和辩证法的。正如蒋廷黻所说,在近代,“我们一面要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到的难关是双重的”,而曾国藩一方面要革新,“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守旧,要“恢复我国固

有的美德”。^{[13] (P30-31, 39)} 这里,“我国固有的美德”和“旧礼教”应指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曾国藩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与开拓创新的思想并非水火不容,“中体西用”揭示了移植外来文化及两种异质文化相融的一般规律。

曾国藩本为传统的坚决捍卫者,不料却戏剧性的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传统的历史中介,他的努力加速了近代中国人冲破藩篱、走向世界的进程。他虽然没有取得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那么大的事功,但其首开风气的地位是无人可取代的。清末学者夏震武指出:“合肥(指李鸿章)、南皮(指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指曾国藩)。……合肥之政术、南皮之学术始终以湘乡为宗,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17] (P354)} 人生一世,得失短长,自有公论。对于曾国藩,我们可以说,在历史的岔路口上,他不自觉地承担起了选择的使命。历史把他推出来,他又回馈于历史,做出了在那个时代能做出的既合情又合理的选择,因而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独领风骚。

[参考文献]

- [1] 曾国藩. 曾文正公奏稿 第 12 卷[M]. 长沙: 传忠书局, 1876.
-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3]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4] 郑焱.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M]. 长沙: 湖南师大出版社, 1996.
- [5]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未刊信稿[M]. 长沙: 传忠书局, 1876.
- [6]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M]. 长沙: 传忠书局, 1876.
- [7] 王安定. 求阙斋弟子记 卷 16[M]. 北京: 龙文斋, 1976.
- [8]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9]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10]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11] 杨国强. 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7.
- [1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13]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 [14] 曾国藩. 曾文正公书札(第 20 卷)[M]. 南京: 中央政治学校总务处印行, 1932.
- [15] 曾国藩.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5.
- [16] 曾国藩. 曾文正公批牍(第 4 卷)[M]. 长沙: 传忠书局, 1876.
- [17] 朱东安. 曾国藩传[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刘范弟]